

历史的观念译丛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22

近代史家批判



〔德〕利奥波德·冯·兰克 著
孙立新 译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schreiber

Leopold von Rank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的观念译丛

近代史家批判



〔德〕利奥波德·冯·兰克 著
孙立新 译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Leopold von Rank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史家批判/(德)兰克著;孙立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

(历史的观念译丛)

ISBN 978-7-301-25875-0

I. ①近… II. ①兰…②孙… III. ①史学理论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2965号

本书主要依据如下底本译出: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von Leopold von Ranke

Dritte Auflage

Leipzig, Verlag von Duncker und Humboldt, 1884

书 名	近代史家批判
著作责任者	[德]利奥波德·冯·兰克 著 孙立新 译
责任编辑	陈 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875-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2印张 266千字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耶尔恩·吕森 (Jörn Rüsen, 德国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

张文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副主编

陈 新 (浙江大学历史系)

斯特凡·约尔丹 (Stefan Jordan, 德国巴伐利亚科学协会历史委员会)

彭 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

编 委

何兆武 (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家和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涂纪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系)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美国斯坦福大学)

娜塔莉·戴维斯 (Natalie Z. Davis,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索林·安托希 (Sorin Antohi, 匈牙利中欧大学)

克里斯·洛伦茨 (Chris Lorenz,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于尔根·施特劳布 (Jürgen Staub, 德国开姆尼斯技术大学)

卢萨·帕塞里尼 (Luisa Passerini, 意大利都灵大学)

埃斯特范欧·R.马丁斯 (Estevao de Rezende Martins, 巴西巴西利亚大学)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尔 (Jürgen Osterhammel,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von
Leopold Ranke.

Eine Beylage
zu
desselben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Geschichten.

Leipzig und Berlin,
bey G. Reimer, 1824.

《近代史家批判》初版书影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Von

Leopold von Ranke.

Zweite Auflage.



Leipzig,
Verlag von Dunder und Humblot.
1874.

**N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  
Von

**Leopold von Ranke.**

———  
Dritte Auflage.

**Leipzig,  
Verlag von Dunder und Humblot.  
1884.**

## Schluß.

### Von dem, was noch zu thun sei.

So viele Schriftsteller über den Anfang der neueren Geschichte auch hier genannt, so viele Bemühungen demselben gewidmet sind, so haben sie doch noch immer Raum für ein künftiges Verdienst gelassen. Wiederholen wir erstens, was von den allgemeineren Geschichtschreibern dieser Periode zu sagen war, so wird Jedermann bekennen, daß ihre Mittheilungen weder zureichend noch authentisch sind, daß wir im Dunkeln tappen, solange wir ihnen geradezu folgen. Wahrhaft original fanden wir nur den Jobius, doch auch ihn voll Lücken, mehr berecht als tief, nicht überall unbefangen. Wir wurden von den allgemeineren auf die Geschichtschreiber von einzelnen Staaten und Ereignissen getrieben.

Indem wir nun zum zweiten wiederholen, was diese geleistet, läßt sich am leichtesten fassen, was noch zu thun sei.

Ueber Italien ist das Meiste allerdings bereits geschehen; doch nicht Weniges ist noch immer zurück. Die florentinischen Geschichtschreiber zuerst haben wohl die inneren Verhältnisse ihres Vaterlandes in dieser Zeit, so zu sagen, vollkommen aufgeklärt, doch nicht die äußeren. Wieviel hier zu leisten übrig sei, bezeugen die Mittheilungen in Fabroni's Lorenzo Medici und in Macchiavelli's Legationen. Fabroni bekennet, es sei ihm nicht möglich gewesen, alle seine Urkunden aufzunehmen, deren eine fast unzählbare Menge sei<sup>1)</sup>; und wenn er sich in seinem Lorenzo beschränkt hat, so hat er es im Leben Leo's X. noch mehr gethan. In Hinsicht auf den Zweck eines Biographen muß man dies billigen; auch in den mitgetheilten Briefen Lorenzo's z. B. kann man seinen klaren Verstand, seine helle und durchsichtige Schreibart bis zu einer gewissen Genüge wahrnehmen. Doch wenn an der genaueren Kenntniß dieser Dinge gelegen ist, der wird hiermit

1) Vita Laurentii. Tom. II, p. 399.

#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 序 一

在跨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当下,如影相随的是,我们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紧迫要求,即必须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及特殊性。由中外学者携手组织的这套丛书,致力于把西方有关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话语带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园地。

历史论题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在归属感和差异的宽泛视界中来看待“世界诸文明”,人们才能够谈及“文化认同”。历史学家的专业学术工作往往涉及并依赖于认同形成的文化过程。由于这种牵涉,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政治都在他们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不管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仅仅只是作为资政的工具,还是因其方法的合理性而有着特别功能,这都已经是公开的问题。

关于历史思维的学术地位的许多讨论,还有它对“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的执着,都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思维之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思维获得了学术学科或者说“科学”(Wissenschaft,采该词更宽泛的意义)的形式。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其自尊就在于,它声称与非专业历史学相比有着更高

层次的有效性。一般用的词就是“客观性”。与这种对客观性的执着相反,许多重要论述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这牵涉到他们与各自国家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例如,后现代主义极力否认客观性这种主张,并且指出,尽管历史研究有其方法的合理性,但对历史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语言假定和文化意义标准等等,历史的解释却有一种根本的依赖。

在意识到了记忆的作用,并且意识到了非专业性因素在异彩纷呈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表现过去的作用之后,发生在历史学内外的、有关历史思想以及它作为学术学科的形式讨论,就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这样一种更迭是否会造成足够重要的后果,影响到历史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角色,这一点还悬而未决。只要记忆与“实际发生的”经验相关,历史就仍然是对集体记忆中这种经验因素的一种言说。

在反思历史思想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工作时,这种视界的扩展因为下列事实而获得了额外的扩大和深化,即:人们为了理解现在、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方式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没有这样的洞见,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历史。既然认同关系到与他者的差异,而历史是呈现、反思和交流这种差异的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必然一直处在对付这种差异的张力之中。“文明的冲突”便是一个口号,它标明,通过回忆和历史形成的认同中存在着紧张因素。

认同不只是界定和奋争的事情,它同时还是理解和认知,这双重因素在历史话语中都必须主题化。每一种认同都因识别出他者而存在,而各种认同或认同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张力以至于斗争或冲突,都不得被理解为一种认知的要求。是什么使得他者出现差异呢?对此不理解,认知就不可能实现。这样,就必须了解他者

的差异中那些强有力的文化要素和过程。

进而,若缺少贯穿这种差异的可理解性原则,认知也不可能。就学术性话语的层面而言,在将历史认同主题化,使之成为差异的一个事例时,这些普遍的要素和维度与专业性历史思维的话语特征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这就是本丛书的出发点,它想把西方世界人们理解、讨论、扩展、批判和利用历史的途径告诉汉语世界。

这套丛书可谓雄心勃勃,它试图展现西方历史话语的整个领域。在思考历史的西方人眼中,西方历史思想是什么?谁的观点成了有影响观点?想象一种单一的西方历史思想类型,并以之与非西方的中国人或印度人的历史思想相比对,这相当容易。但更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西方并没有这样一种类型,即单一的“观念”“概念”或者“根本”。相反,我们找到了一种话语,它呈现出各种不同概念、观点和实际作用之间错综分合的交流。这套丛书便展现了这种多样性和话语特征,当然,非西方世界也会有类似情形。

本丛书分为作者论著和主题文集两类出版。第一类选取该作者对历史话语而言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品,第二类则选取历史话语中的一些中心主题。每一卷都有介绍该作者或主题的导论、文本注释和文献目录。

本丛书期待对历史学领域中在新的层次上并且是高质量的跨文化交流有所贡献。它抱着这种呈现更广泛的意见、立场、论证、争执的雄心壮志,希望成为跨文化交流中类似研究的范例,使不同文化彼此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领域内,就一种对文化差异彼此了解的新文化来说,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耶尔恩·吕森

2006年5月于德国埃森

## 序 二

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思想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源。历史的观念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演绎,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还随着思想家们不断的思考、表现而获得扩充。

我们往往通过书本了解思想家对历史的看法,但对于读者自身而言,我们却不能只是从书本中理解历史。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中,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经历将成为历史,而是指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从历史中获取意义,获取人生在某个时刻具有的确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这是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所追求的。但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可遗传的或可积累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发展它。思想家对过去的理解与认识、对历史这个观念的思考,以及对与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探询,这些都只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这块荒原提供各式各样的工具,却不提供秋收的果实。

系统地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作品,一直是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者的梦想。这个梦想曾经深藏在何兆武先生年轻的头脑中,此后,他身体力行,译著丰卓,为拓展国人的历史思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今,跨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国内学术事业的繁荣,使得这一梦想更有可能变为现实。

本丛书有幸得到了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教授的大力支持。吕森教授认为,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利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现存诸种文化可以包含在其中,但它们了解彼此的差异,尊重彼此的习惯;平等交流使得我们可以跨越文化鸿沟,同时拓宽我们理解历史的文化限度。这也是中方编辑者的初衷之一。这样,中德双方

组织者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从丛书框架、选题的设计,到约请编译者,乃至沟通版权,一项项艰巨的任务在数年来持续不断的交流与努力中逐渐得到落实。

丛书编者有着极大的雄心,希望以数十年的努力,将西方 18 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重要文献渐次翻译,奉献给汉语世界。如果可能,这套丛书还将涉及非西方世界史学思想的文献。

显然,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跨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一项民间的学术事业,在此,我们要对所有帮助这套丛书出版的编者、译者、出版者表示感谢。愿这样的努力,也能够得到读者的关注、批评与认可。

张文杰 陈 新

2006 年 5 月

## 编者导言

耶尔恩·吕森 斯特凡·约尔丹

如同有“历史学之父”美名的希腊最早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Herodot, 大约在公元前 484 年生于爱琴海畔的哈利卡那苏斯城, 卒于公元前 425 年) 一样, 利奥波德·冯·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常常被称为近代德国“历史学之父”。对于兰克的这种评价, 一方面, 似乎有些过高, 因为德国早在 18 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专业化和科学化进程; 不过, 从另一方面来看, 德语地区确实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够像兰克那样不仅对于自己国家而且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学的形成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属于兰克学派的历史学家, 有格奥尔格·韦茨 (Georg Waitz, 1813—1886)、威廉·吉泽布雷希特 (Wilhelm Giesebrecht, 1814—1889)、海因里希·冯·聚贝尔 (Heinrich von Sybel, 1817—1895) 和年轻的瑞士人雅各布·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他后来为艺术—文化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以及阿克顿勋爵 (Lord Acton, 1834—1902)——他对于 19 世纪末期的英国历史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以上提及的各位历史学家都是积极接受兰克思想的欧洲代表人物。乔治·班克罗夫特 (George Bancroft, 1800—1891) 则在美国传播了兰克思想; 兰克去世之后, 他的私人藏书也卖到了美国 (纽约锡拉丘斯 [Syracuse] 大

学)。直至今日,当人们进行所谓后现代化的国际性讨论,特别是研究如何区别历史事实与历史撰述的时候,往往还要谈及兰克关于科学客观性(wissenschaftliche Objektivität)和个人无先入之见(persönliche Unvoreingenommenheit)的理想主张。

## 一 兰克其人

利奥波德·冯·兰克是历史学方面的非凡人物,他的出身,特别是他早期的发展和成长过程在19世纪初期的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当中是很典型的。像他的大部分专业同行一样,兰克出生于一个新教(基督教)神学家家庭。有证据表明,他的祖先从17世纪中叶起就是曼斯费尔德(Mansfeld,在图林根[Thüringen])伯爵领地的牧师。他的祖父约翰·海因里希·伊斯雷尔·兰克(Johann Heinrich Israel Ranke, 1719—1799)在翁施特鲁特河畔(Unstrut)的里特堡(Ritteburg)担任牧师。正统的虔信的家庭职业传统在兰克的父亲戈特罗布·伊斯雷尔·兰克(Gottlob Israel Ranke, 1762—1836)这一代中断了,他在翁施特鲁特河畔的维厄(Wiehe)开业当律师和法律顾问。他继承了母亲的一笔遗产,从而保证一家人能过上舒适的中产阶层的生活。尽管兰克的名字利奥波德(Leopold)后面不再按照家庭传统继续加上《旧约》教名“伊斯雷尔”(Israel),而是加上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非圣经名字“弗朗茨”(Franz),但兰克一生都受到了他虔诚信仰基督教家庭的决定性影响。新教信仰和中产阶层出身形成了兰克早期乃至他毕生事业的重要特色。兰克从青年时期直至大学时期的作品,主题多为宗教问题,后期的著作比如《教皇史》(*Die Geschichte der Päpste*)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也是致力于教会

和宗教历史题材的。他其余的著作同样反映出明显的新教世界观。

1795年12月21日,(弗朗茨·)利奥波德·兰克生于维厄。他是家中长子,下面有八个弟弟妹妹。父亲名叫戈特罗布·伊斯雷尔·兰克,母亲名叫弗里德里克(Friederike,1776—1836),她的父姓是勒米克(Lehmiecke)。兰克小时候先是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1807年春天开始上多恩多夫(Donndorf)修道院的寄宿学校。1809年5月,转到了位于普福尔塔(Pforta)的一所很有名气的萨克森邦贵族学校,在那里学习了全面的文科知识。1814年复活节,兰克文科中学毕业,之后获准在莱比锡(Leipzig)大学注册入学。他决心选择研究神学的道路。他的两个弟弟海因里希(Heinrich,1798—1878)和恩斯特(Ernst,1814—1888)也选择了同样的职业生涯。后来兰克的职业愿望发生了变化,因为他在学习福音新教神学和语文学的过程中深受他的大学老师戈特弗里德·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1772—1838)和克里斯蒂安·丹尼尔·贝克(Christian Daniel Beck,1754—1832)的影响。赫尔曼介绍兰克成为莱比锡语文学协会的成员,指导他学习并掌握了文献考证和注释等研究方法。赫尔曼本人主要研究修昔底德(Thukydides)的著作。后来兰克正是在他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赫尔曼是德国“语言语文学”(Sprachphilologie)的独具风格的维护者,他所代表的语文学主张审慎地对文献进行注释。兰克的另一位老师贝克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但在科学认知方面更为现代,他属于“内容语文学”(Sachphilologie)的代表。“内容语文学”的目的在于从历史前后关系上解释著作,而“语言语文学”强调的是对于历史知识的叙述。兰克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对涉及史实和史料的文章颇为敏感,同时他十分强调对于这些文章进行考证和评注的必要性。除此而外,兰克从大量阅读中所获得的经验更增强了他对历史的兴趣。

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1831)关于罗马史的讲稿于1811—1812年印成了两卷集,这两卷《罗马史》成了兰克对历史资料进行考证研究工作的楷模。另外,兰克还非常喜欢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的历史小说,特别是他于1814年出版的《威弗利》(*Waverly*)。从这里人们不难找到兰克著作极具叙述才能的根源。

1817年,兰克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柏林通过了获取较高教师职位资格的国家考试。第二年,他取得了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一所高级文科中学教历史和古代语言的首席教师职位,同时开始撰写他的处女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该书于1824年11月出版。正是凭借这本书,兰克在1825年4月被任命为柏林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在普鲁士首府柏林,兰克和拉埃尔·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 1771—1833)的文学沙龙有了接触。1825年2月,拉埃尔·法恩哈根的丈夫卡尔·奥古斯特·法恩哈根·冯·恩瑟(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 1785—1858)在《施佩纳报》(*Die Spenersche Zeitung*)上发表了一篇赞扬性的评论,从而引起了公众对于兰克著作的兴趣。在法恩哈根家里,兰克和一些普鲁士早期著名的知识分子有了联系。他们当中有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神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雕刻家克里斯蒂安·劳赫(Christian Rauch, 1777—1857)和约翰·戈特弗里德·沙多(Johann Gottfried Schadow, 1764—1850)、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 1781—1841)以及作家贝蒂纳·冯·阿尔尼姆(Bettina von Arnim, 1785—1859)、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 1773—1853)和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